2014 年第 3 期
（第 13 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家庭结构、重大疾病和农村劳动力迁移

陈风波[1]，丁士军[2]，Henry Lucas[3]

（1.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3.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Brighton East Sussex BN1 9RE）

摘　要：在四川省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基础上，利用 Probit 模型分析了家庭结构特征对农村年轻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的前提下：三代同堂家庭显著支持了年轻劳动力外出，而核心家庭对劳动力的外出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中有未成年人会限制年轻劳动力的外出；年轻配偶的重大疾病显著地影响了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的严重疾病反而促使年轻劳动力外出，但如果家庭中存在未成年人，则老年人的严重疾病会对年轻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究结果突出体现了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分工行为，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应该予以重视。

关键词：劳动力迁移；家庭结构；重大疾病；农村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4)03－0034－11

一、前　言

对于劳动力的迁移行为，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1]：一种是基于微观经济理论的视角；另一种是基于历史结构的视角（historical-structural perspective）。微观经济理论的视角关注迁移主体个人的理性选择，认为劳动力迁移行为是一种对劳动生产力的投资，个体在迁移过程中会对迁移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从而决定是否迁移和迁移地点[2]；基于报酬高低的选择，劳动力一般从资本缺乏和劳动力丰裕的地方流向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地区，或者说从劳动生产力低的地方流向生产力高的地方[3]。历史结构的分析视角则关注影响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根源，这些根源往往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关，因而需要关注某个阶层和群体的迁移行为，而不仅仅是单个个体的迁移行为[4]。在现实中，个体的迁移行为一方面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时个体行为的理性选择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过程中两者不能绝然分开。对家庭（户）行为的研究是将个体特征和社会因素结合对劳动力就业、消费模式和迁移行为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5-6]。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劳动力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家庭层次的劳动力配置的过程[1]，个体迁移行为会受到家庭特征的极大影响。只关注迁移者个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会忽视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和宏观环境的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改变了农户单一依靠农业生产的状况，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缓解了贫困[7-9]。人口迁移也同时改变了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和家庭内部的分工，农村家庭中的年轻人特别是已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赚钱寄回家，而老年人在家务农并照顾未成年人的现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在空间上分裂的家庭。大量针对中国

收稿日期：2014－02－17

基金项目：欧盟第六轮框架计划资助项目（INCO－CT－2005－517657）

作者简介：陈风波（1978—），男，湖北天门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和农户经济。E-mail：cfb@scau.edu.cn

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的研究集中在对迁移者个体特征和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而家庭特征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研究显示，年轻的男性劳动力更容易在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留守在农村的主要是老年人、妇女和学龄或学龄前儿童[10-12]；但是，也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已婚妇女也加入到迁移的行列[13]；教育水平高低和迁移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14-15]。由于家庭结构是家庭内部分工的基础，其结构特征可能会极大影响到迁移者的决策行为。本研究将在大样本调查数据基础上，分析迁移主体特征和家庭结构特征对农村青年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样本特征及研究假设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欧盟资助的项目 POVILL，具体选取了该项目对四川省国家级贫困县富顺县和阆中县的调查数据。农村调查在 2006 年 7—8 月进行，每个县随机选取 3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10 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 100 户左右的农户，对农户家庭成员特征进行调查，两个县共调查 6054 户，包含家庭成员 25534 人。

在本研究中，农村家庭（户）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家庭（household or domestic unit）往往被定义为长期居住在一起分享共同消费和预算，共同分配资源（包括劳动力）来进行再生产的群体[5]。在当前中国，对农村家庭进行统一定义存在很大困难。中国的农村家庭正处在快速变化中，年轻人和父母尽管分别居住在城市和农村，但依然拥有相同的户籍，用共享消费和预算的概念并不完全合适。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户的概念主要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共同判断来进行，亲缘关系、频繁的汇款以及户籍相同构成了主要判断标准。

（二）样本特征

根据年龄和户内成员之间的关系，调查户主要分为三类：三代同堂家庭，核心家庭和夫妇居住或单人独居户。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三代同堂家庭所占比例最大，为 46%，核心家庭占 21%，而夫妇居住或单人独居家庭占 21%①。但三代同堂和核心家庭并不意味着这些家庭的成员居住在一起。图 1 显示，农村户籍人口中，小于 16 岁的人口约 80% 居住在农村；45～60 岁之间的人口约 87% 居住在农村；大于 60 岁的人口约 97% 居住在农村；而在 16～44 岁之间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的只占约 27%。可见，居住在农村的主要为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年轻人大多外出了②。

表 1　调查户家庭结构

家庭类别	频次	%
三代同堂	2756	45.52
核心家庭	1525	25.19
夫妇或单人独居	1288	21.28
其它	485	8.01
合计	6054	100.00

数据来源：POVILL 项目数据。

如果仅仅关注家庭中有小于 16 岁未成年人的三代同堂家庭，则可以进一步了解这类家庭成员的居住结构。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这类家庭中：大约 89% 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劳动力外出务工；大约 55% 的家庭中年轻夫妇同时外出务工；所有家庭成员都留在农村的家庭只占约 11%；有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家庭中只有大约 18% 的未成年人和父母同时外出，大部分学龄儿童或学龄前儿童留在农村地区。农村中的学龄儿童不能跟随父母到务工地上学可能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教育体系有着重要关系，拥有农村户籍的学龄儿童很难被城市的学校接纳或者需要承受高昂的成本[16]。

① 数据显示夫妇或单人独居家庭人均年龄超过 50 岁，可见这个群体大部分为老年人。这种现象和农村人口老年化和年轻人外出可能有着直接联系。

②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外出务工人群 2005 年平均外出时间为 10 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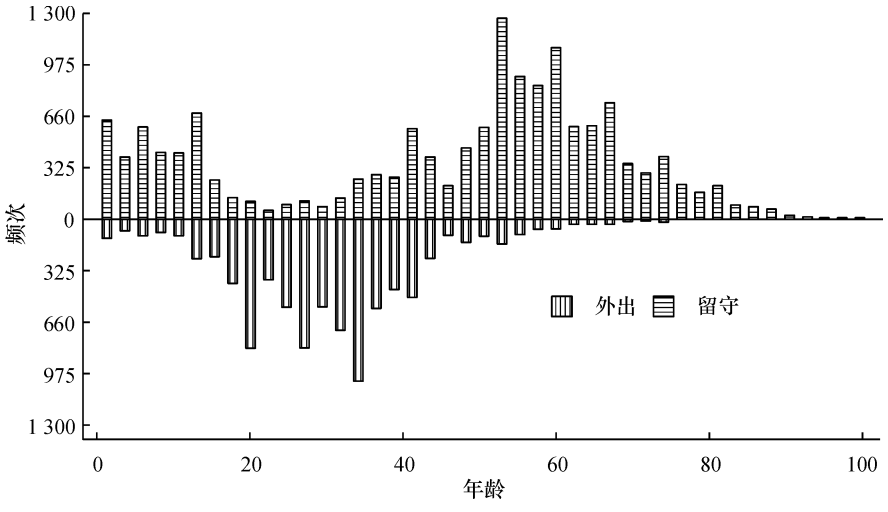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年龄农村人口外出和留守情况

数据来源:POVILL项目数据。

表2 三代同堂家庭的劳动力外出情况

农户类型	频次	比例/%
年轻夫妇外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留守	1259	54.72
年轻夫妇中一个人外出,其他人留守	138	6.00
老年人在家,年轻夫妇和未成年人同时外出	414	17.99
无人外出	248	10.78
其它	242	10.52
合计	2,301	100.00

数据说明:由于未成年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界限的模糊性,本文中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界定考虑到个体在家庭中与户主关系以及自身年龄两个因素,户主有孙辈,则其儿子儿媳(或女儿女婿)界定为年轻夫妇,户主和配偶界定为老年人;如户主无孙辈,则其与配偶界定为年轻夫妇,其父母界定为老年人;小于16岁的人口界定为未成年人。

数据来源:POVILL项目数据。

农村家庭的内部分工有着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差异。从表3中可以看出:16~44岁之间的劳动力主要从事非农工作;男性人口中,45~60岁的人口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60岁以上男性中,69%以上依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约13%从事家务劳动,约12%不参与生产活动;60岁以上的女性中有50%以上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约30%从事家务劳动。

表3 调查户家庭内部分工 **单位**:%

年龄	<16		16~44		45~60		>60	
性别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农业生产	0.26	0.11	12.68	23.99	74.46	80.59	69.28	53.60
非农工作	0.35	0.29	68.60	56.90	15.14	3.44	2.12	0.61
家庭企业	0.04	0.06	5.68	5.55	4.59	3.37	2.24	0.79
政府雇员	0.00	0.00	2.31	1.04	1.83	0.37	1.08	0.04
家务劳动	0.09	0.11	0.44	3.73	1.99	10.62	13.18	30.07
学生	67.94	66.76	8.35	6.97	0.00	0.00	0.00	0.00
其它	31.32	32.67	1.93	1.82	1.99	1.61	12.11	14.8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POVILL项目数据。

（三）家庭人口结构和劳动力迁移 – 一个农户生计模型

从农户样本特征可以看出，调查地区的农户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家庭内部分工模式：老年人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照料孙辈，承担家务活和照看房子，年轻人则在外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通过向农村汇款以缓解家庭经济上的压力。这种分工使得农村家庭在维持基于农业生产的传统生计的同时，年轻劳动力能融入城市，通过工资性收入来改善家庭生活。

家庭内部的分工很大程度上显示当前农村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大量研究中，农村老年人似乎成为一个非常边缘化而不重要的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养老保障、失业救助及医疗保障，他们依靠有限的农业收入和在外工作子女的汇款维持基本生活[17]。但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这些老年人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承担着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照顾年幼的孙辈，从而支持了年轻人的外出务工，同时他们还是整个农村社会安全网的重要部分，一旦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失去工作，农村家庭依然成为他们临时住所以维持基本生计。从微观的角度看，这种家庭分工模式提高了家庭的经济收入，减少了贫困；从宏观角度来看，也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在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起到了社会稳定的作用。

如果从年龄和性别两个纬度来分析农户的内部家庭结构，可以将典型的三代同堂的家庭分为老年夫妇、年轻夫妇和孙辈三个层次；而核心家庭则分为年轻夫妇和子女。基于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特点，构建一个农村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生计模型（图 2）。在这这个生计模型中，老年夫妇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非农务工，其中老年男性更多从事体力性的劳动，而老年女性更多从事家务劳动，他们承担家庭农村部分的未成年人照料、食物的供应、房屋的照料等；年轻人则在外务工或经商，获得现金收入，在必要的时候汇款给农村老人，以支付医疗、教育等费用。这个家庭的农村部分主要功能是维持基本生计需求，而城市部分则是通过大量的就业机会来获得更多现金收入，从而改善整个家庭的生计。对于核心家庭，由于缺乏老年人的帮忙，如果未成年不能跟随父母在务工地上学，则可能需要留下夫妻一人在家务农并照顾后代，从而减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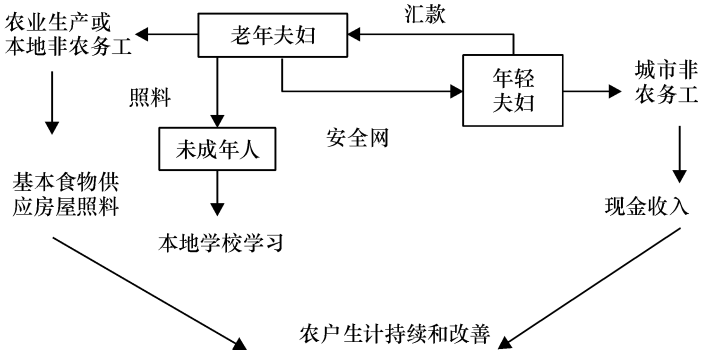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农村家庭内部分工及生计模式

结合图 2 的农户生计模型，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1）三代同堂的家庭比核心家庭更有可能支持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

（2）家庭中有两位老年人的三代同堂家庭比只有一个老年人的三代同堂的家庭更容易支持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

（3）家庭中没有未成年人的家庭比有未成年人的家庭更有可能支持劳动力的迁移行为；

（4）疾病会影响到家庭内部劳动力配置，如果家庭中有老年人生病，基于孝道和照顾的需要，则年轻人可能会留在家中；未成年人的疾病可能会对年轻人的迁移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劳动力自

身疾病会对自身及其配偶迁移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三、计量模型

(一)Probit 模型设定

从农户调查数据得到关于家庭劳动力个人特征的数据,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结合家庭每个成员的特征,可以得到关于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的数据,从而可以通过控制个体成员特征来分析家庭人口结构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①。

对于个体而言,理性人的假设假定个体都会通过选择工作在有限的时间实现最大收入,最终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收入水平和个体人力资本紧密相关,包括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技能和工作经历等。但作为一个家庭中的一员,如果将家庭作为一个利益分配的单位,则个体的选择需要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偏好以及户内活动机会成本,这两者都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特征有着紧密关系,其中家庭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人口结构特征[18]。农村家庭中未成年人的照料往往需要在家庭内部解决,除了生活成本和教育费用的开支,心理和亲情支持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非常重要,而老年人生病之后的照料尽管可以通过雇佣护工来解决,但也需要考虑成本和道德的问题。

在调查数据中,我们将农村劳动力主要工作状态分为两类:(1)外出务工;(2)本地农业生产或本地非农务工。在此分类下,农村劳动力的工作选择就是一个二元选择模型。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已经大量被应用于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分析[7,15,19]。本研究将采用 Probit 模型对劳动力迁移行为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mathrm{Pro}bit(M_i = 1) = \int_{-\infty}^{\rho+\varepsilon Y_i+\delta Z_i+\gamma I_i} \Phi(x)\, d_x$$

其中 M_i 是代表劳动力的工作状态,如果劳动力外出务工,则为 $M_i = 1$,如为本地农业生产或本地非农务工,则 $M_i = 0$。Y_i 代表劳动力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态等;Z_i 代表劳动力所在家庭的结构特征,如是否核心家庭、是否有老年人和未成年人。I_i 代表家庭成员是否患有严重疾病,如未成年人的疾病、配偶的疾病和老年人疾病等。

(二)因变量和解释变量

为了集中分析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群体,本文主要关注 16~44 岁(含 16 岁和 44 岁)已经从事工作的农村家庭劳动力②。

劳动者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根据农户家庭成员信息对农户家庭人口结构特征进行总结,将家庭分为如下几类:(1)一个老年人和年轻夫妇及大于 16 岁的孙辈同户;(2)一个老年人和年轻夫妇及小于 16 岁的孙辈同户;(3)老年夫妇和年轻夫妇及大于 16 岁的孙辈同户;(4)老年夫妇和年轻夫妇及小于 16 岁的孙辈同户;(5)夫妇和大于 16 岁孩子同户;(6)夫妇和小于 16 岁孩子同户;(7)夫妇两人居住或单人独居。

由于老年人的疾病会影响到对未成年孙辈的照料,增加户内照料的需求和影响到农业生产,

---

① 在本研究中,家庭结构由家庭成员的构成决定,由于家庭概念的模糊性,比如分家等因素,部分原来被包含在家庭成员中的人外出会影响到家庭的结构,如果迁移劳动力没有被算作家庭成员,则这一部分人并没有纳入到研究中),所以家庭结构对于劳动力的迁移行为而言是外生变量,并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② 16~45 岁的学生、军人以及未能参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成员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调查数据中有 8 人未能获得受教育程度信息,也未列入研究对象。

为了分析家庭中老年人对家庭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本研究将老年人自我报告的严重疾病[①]信息纳入模型，结合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可以得到如下变量：第（1）类家庭中老年人患有严重疾病；第（2）类家庭中老年人患有严重疾病；第（3）类家庭中老年人患有严重疾病；第（4）类家庭中老年人患有严重疾病。

具体解释变量如表 4 所示，其统计值特征如表 5 所示：

表 4　解释变量及对劳动力外出可能的影响

变量	变量描述	影响方向
个人特征变量		
age	年龄	+
age2	年龄的平方	−
sex	性别（0 = 女性；1 = 男性）	+
mar	婚姻状况（1 = 未婚；2 = 已婚；3 = 离婚；4 = 丧偶）	?
phys_sta	与其他人相比的健康水平（1 = 很差；2 = 差；3 = 一般；4 = 好；5 = 较好）	+
edu	受教育程度（1 = 文盲；2 = 小学；3 = 初中；4 = 高中；5 = 中专；6 = 大专及大专以上）	+
农户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变量		
k1	1 = 一个老年人和年轻夫妇及大于 16 岁的孙辈同户；0 = 其他	+
k2	1 = 一个老年人和年轻夫妇及小于 16 岁的孙辈同户；0 = 其他	?
k3	1 = 老年夫妇和年轻夫妇及大于 16 岁的孙辈同户；0 = 其他	+
k4	1 = 老年夫妇和年轻夫妇及小于 16 岁的孙辈同户；0 = 其他	+
k5	1 = 夫妇和大于 16 岁孩子同户；0 = 其他	+
k6	1 = 夫妇和小于 16 岁孩子同户；0 = 其他	−
k7	1 = 夫妇单独居住或单人独居；0 = 其他	?
疾病的影响变量		
chil_m	家庭中有未成年有重大疾病	−
sp_m	年轻配偶有重大疾病	−
old_m	老年人有重大疾病	−
self_m	年轻人自己有重大疾病	−
old_m	1 = 大于 45 岁的成员有严重疾病；0 = 其他	−
old_m_th_1	1 = 大于 45 岁的成员有严重疾病，同时 k1 = 1；0 = 其他	−
old_m_th_2	1 = 大于 45 岁的成员有严重疾病，同时 k2 = 1；0 = 其他	?
old_m_th_3	1 = 大于 45 岁的成员有严重疾病，同时 k3 = 1；0 = 其他	?
old_m_th_4	1 = 大于 45 岁的成员有严重疾病，同时 k3 = 1；0 = 其他	?

注：“+”表示该变量会对劳动力外出产生正面影响，“—”表示该变量会对劳动力外出产生负面影响，“?”表示影响方向不确定。

① 针对严重疾病的定义，POVILL 项目在具体调查中采用三个标准：劳均住院费大于等于 1000 元；劳均住院费小于 1000 元，且劳均门诊费大于等于 1000 元；劳均住院费和劳均门诊费小于 1000 元，且户劳动力误工时间超过 90 天。主要通过被调查人所报告的信息进行判断而获得。

表5 解释变量统计值特征

变量	留守(*N*=3063)		迁移(N=6246)		合计(*N*=9309)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age	36.517	6.991	30.589	6.916	32.540	7.479
age2	1382.385	467.024	983.512	424.667	1114.756	477.363
sex	0.379	0.485	0.565	0.496	0.503	0.500
_Imar_2	0.904	0.294	0.778	0.416	0.820	0.385
_Imar_3	0.011	0.106	0.015	0.120	0.014	0.116
_Imar_4	0.008	0.090	0.004	0.059	0.005	0.071
phys_sta	2.977	0.944	3.425	0.809	3.277	0.882
edu	2.312	0.805	2.711	0.783	2.580	0.812
k1	0.076	0.265	0.061	0.239	0.066	0.248
k2	0.175	0.380	0.144	0.351	0.154	0.361
k3	0.009	0.093	0.025	0.157	0.020	0.140
k4	0.198	0.398	0.510	0.500	0.407	0.491
k5	0.192	0.394	0.121	0.327	0.144	0.352
k6	0.284	0.451	0.066	0.249	0.138	0.345
k7	0.011	0.103	0.001	0.031	0.004	0.065
chil_m	0.058	0.235	0.058	0.234	0.058	0.234
sp_m	0.163	0.370	0.142	0.350	0.149	0.356
old_m	0.265	0.441	0.489	0.500	0.415	0.493
self_m	0.284	0.451	0.095	0.294	0.157	0.364
old_m_th_1	0.034	0.182	0.034	0.181	0.034	0.181
old_m_th_2	0.074	0.261	0.059	0.236	0.064	0.245
old_m_th_3	0.005	0.067	0.018	0.133	0.014	0.116
old_m_th_4	0.098	0.297	0.290	0.454	0.227	0.419

说明:婚姻状态变量以虚拟变量纳入模型,未婚作为其他婚姻状态的对照。

数据来源:POVILL项目数据。

四、模型结论

表6中列出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从中得到劳动力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对迁移行为的影响。

(一)个体特征对迁移行为的影响

从个人特征角度来看,和大量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类似,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迁移行为有着显著影响。随着年龄(age)的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但年龄平方(age2)则和劳动力外出可能性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并不是永久性的,随着劳动力年龄的持续增加,最终他们会返回农村。

性别变量(sex)和迁移行为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农村年轻男性劳动力的迁移可能性要远高于年轻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劳动力基于性别差异的内部分工,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多选择留在农村地区从事家务和农业生产活动。

已婚、离婚或丧偶(_Imar_2, _Imar_3, _Imar_4)的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未婚劳

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婚姻状态对迁移行为的影响，未婚农村劳动力较少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而已婚劳动力可能会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更有可能留在农村从事本地非农工作和农业生产，以兼顾照料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责任。

代表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edu）和健康状况（phys_sta）与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更高。这反映户内分工很大程度考虑了家庭内部成员人力资本的差异：外出务工对身体素质和技能要求较高，获得收入也较高，而本地工作由于有家庭内部照料，从事简单体力活动，对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要求相对较低。

表 6　Probit 模型分析结论

	dF/dx	Std. Err.	z	P > z
age	0.0659	0.0078	8.5000***	0.0000
age2	-0.0012	0.0001	-10.3600***	0.0000
sex	0.1403	0.0109	12.7300***	0.0000
_Imar_2	-0.1920	0.0186	-8.6200***	0.0000
_Imar_3	-0.1893	0.0610	-3.2700***	0.0010
_Imar_4	-0.2186	0.0890	-2.5700**	0.0100
phys_sta	0.0424	0.0066	6.4600***	0.0000
edu	0.0622	0.0073	8.5000***	0.0000
k1	0.0259	0.0368	0.6900	0.4910
k2	0.0423	0.0275	1.5000	0.1340
k3	0.2075	0.0347	3.8700***	0.0000
k4	0.1740	0.0251	6.6200***	0.0000
k5	-0.1621	0.0318	-5.3400***	0.0000
k6	-0.2081	0.0314	-6.9300***	0.0000
k7	-0.3682	0.1039	-3.4000***	0.0010
chil_m	-0.0086	0.0229	-0.3800	0.7050
sp_m	-0.0587	0.0159	-3.7800***	0.0000
old_m	0.1246	0.0240	5.0700***	0.0000
self_m	-0.1969	0.0170	-12.1100***	0.0000
old_m_th_1	-0.0829	0.0523	-1.6500*	0.0980
old_m_th_2	-0.1381	0.0396	-3.6700***	0.0000
old_m_th_3	-0.0240	0.0927	-0.2600	0.7920
old_m_th_4	-0.0779	0.0324	-2.4600**	0.0140

注：Number of Obs = 9309；LR chi2(23) = 3202.56；Prob > chi2 = 0.0000；Log likelihood = -4295.918；Pseudo R2 = 0.2715；“***”表示统计值在置信度 1% 水平显著；“**”表示统计值在置信度 1～5% 水平显著，“*”表示统计值在置信度 5～10% 水平显著。

（二）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对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影响

从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的角度来看，表 6 的分析结论基本符合研究假设。对于三代同堂的家庭，有两个老年人农村家庭（k3，k4）显著支持了年轻人的外出工作，特别是家庭中有 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对年轻人外出工作支持力度更大，这凸显了家庭中未成年人存在条件下老年人支持年轻人外出的重要性；而有一个老年人的家庭（k1，k2）支持了年轻人外出工作，但这种关系并

不显著。这印证了有两个老人的家庭比有一个老人的家庭更能支持年轻人的外出就业的假说。

对于核心家庭类型(k5,k6),不管是家庭是否存在小于16岁的未成年人,其和家庭劳动力外出之间的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家庭中有小于16未成年人的家庭相对于没有16岁未成年人的家庭对劳动力外出的负面影响更大。可见由于缺乏老年人的帮忙,夫妻或其中一人需要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照料房子和未成年人,从而降低了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这也印证了三代同堂家庭比核心家庭更能支持年轻人外出的假说。

而对于夫妻独居或单人独居的家庭(k7),这类家庭结构和劳动力的外出可能性也呈现显著负相关,这可能和这类家庭主要由老年人组成有很大关系。

(三)家庭成员疾病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疾病会减少家庭劳动力供给,增加家庭内部照料性劳动需求,从而极大改变原有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模式。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的重大疾病(chil_m)并没有显著影响年轻劳动力外出行为,而年轻配偶的重大疾病(sp_m)则显著对年轻劳动力的外出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年轻劳动力自身(self_m)的重大疾病显然也阻碍了其外出务工。

针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留守的现象,本文进一步分析农村老年人重大疾病和家庭中年轻人外出工作的关系。当农村老年人生病时,意味着原有的基于农村和城市,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分工模式受到挑战,从而可能会影响到年轻劳动力的外出。根据Giles和Mu[17]的研究结论,当农村老年人发生严重疾病时,外出务工的子女会回家照料,但从表6中可以看出,老年人严重疾病(old_m)似乎不仅没有影响到家庭劳动力的外出,而且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的外出。对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是老人严重疾病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开支,从而使得年轻人需要通过外出务工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子女也可以通过汇款来购买医疗服务从而替代自己返家照料生病的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的慢性病,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年轻劳动力在家照料老年人意味着丧失外出务工的收入,这可能使家庭面临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

如果考虑家庭人口结构特征,老年人的疾病对劳动力的外出的影响则是另一个结果。对于只有一个老年人的三代同堂的家庭,老年人的严重疾病(old_m_th_1, old_m_th_2)对劳动力的外出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样的家庭中如果有小于16岁的未成年人(old_m_th_2),则老年人的严重疾病对年轻劳动力的外出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家庭中唯一的老年人生病之后会对未成年人的照料会产生影响,从而年轻夫妇中需要有人返家或留在家中照料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而对于家庭中两个老年人的三代同堂的家庭,如果家庭中没有小于16岁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的严重疾病(old_m_th_3)对劳动力的外出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老年人之间的可以通过相互照料来维持农村家庭的运转,年轻人并不会因为老人严重疾病返回农村;如果这样的家庭中有小于16岁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的严重疾病(old_m_th_4)则会对劳动力的外出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这意味着一个老年人在照顾生病的另一个老年人时,可能无法照顾家中的未成年人,从而外出的劳动力可能返家或留在家中承担照料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责任。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劳动力个体特征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和早期相关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农村劳动力中的青壮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健康状况较好的劳动力发生迁移可能性较大,男性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显著高于女性劳动力,已婚的劳动力迁移概率显著低于未婚劳动力。

（2）有两个老年人的三代同堂家庭显著支持年轻劳动力的迁移，而核心家庭的年轻劳动力的外出可能性显著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农村老年人所发挥的作用。

（3）农村家庭中的未成年对年轻劳动力的迁移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核心家庭中，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在核心家庭中，由于缺乏老年人照料，年轻夫妇中至少一人需要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照料未成年的孩子。而在有两位老年人的三代同堂家庭中，即便家庭中有未成年的孩子，由于老年人承担了未成年人的照料，从而显著支持了年轻劳动力的迁移行为。

（4）对家庭成员疾病变量的分析进一步反映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紧密的关系。年轻配偶的重大疾病显著地影响了年轻人的迁移行为，尽管老年人严重疾病反而使得年轻劳动力迁移，但如果家庭中存在未成年人，则老年人严重疾病会对年轻劳动力迁移会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这进一步说明老年人在照料未成年人方面的作用。

可见，尽管中国农村家庭规模在不断缩小，核心家庭比例在不断增加[20]，但在大量劳动力迁移的背景下，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构成了家庭内部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显著支持了年轻劳动力迁移行为。这反映出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中国农村家庭依然发挥着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但家庭结构差异对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影响反映了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或不完善条件下农村家庭所采取的不同的生计策略，并对家庭收入和未来发展产生影响，那些不能或者外出困难的农村家庭无法获得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从而可能长期陷入贫困。在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维系当前家庭内部的分工模式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微观农户生计都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未成年人的异地就学制度和降低就学成本将使得农村劳动力在迁移地务工的同时照料孩子成为可能；农村老年人的严重疾病和年轻配偶的疾病将使得家庭内部的分工无法持续，通过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针对性服务，将能在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的同时支持年轻人的外出就业。此外，对于那些在城市工作的外出务工人员，应该将他们纳入城市医保系统，以免他们因为暂时的疾病而返回农村。以上措施将能在一定程度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劳动力供应，同时维持农村地区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WOOD C H. Structural Changes and Household Strategi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Rural Migration [J]. Human Organization, 1981, (4): 338 – 344.

[2]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1): 138 – 148.

[3] SPENGLER J, Myers G C. 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oday and Yesterday [C] // A Brown, E Neuberger. In Internal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11 – 35

[4] WOOD C H. Equilibrium and Historical-structural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82, 16(2): 298 – 319.

[5] SCHMINK M. Household Economic Strategies: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984, 19(3): 87 – 101.

[6] 杨国强，汪兴东，梁志文，等.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J]. 宏观质量研究，2014，(1)：94 – 101.

[7] ZHAO Y.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281 – 286.

[8] DE BRAUW A, HUANG, J SCOTT R,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2): 329 - 353.
[9] 都 阳,朴之水. 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J]. 中国农村观察,2003,(5): 2 - 9.
[10] FAN C C.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ransitional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27(1): 24 - 47.
[11] MU R, Van De Walle D. Left Behind To Farm? Women's Labor Re-Allocation in Rural China [J]. Labour Economics,2011,18(S): 83 - S97.
[12] ZHONG F, XIANG J.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Rural China[C] // Huw McKay, Ligang Song. Rebalancing and Sustaining Growth in Chin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E Press,2012:251 - 263.
[13] ROBERTS K, ET AL. Patterns of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of Rural Women from Anhui and Sichuan[J]. The China Journal,2004,(52): 49 - 70.
[14] 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s to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7,79(4): 1278 - 1287.
[15] 王德文,蔡 昉,张国庆.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 经济学(季刊),2008,7(4): 1131 - 1148.
[16] KWONG J. Educating Migrant Children: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 180(1): 1073 - 1088.
[17] GILES J, MU R. Elderly Parent Health and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Adul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 Demography,2007,44(2): 265 - 288.
[18] CHAYANOV A V.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M]. Th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6:53 - 89.
[19] 张宗益,王 卫,张成翼. 非农劳动力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07,(4): 63 - 69.
[20] 王跃生.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1(96): 108.

Household Demographic Structure, Serious Illness, and Rural Migration

CHEN Feng-bo[1], DING Shi-jun[2], Henry Lucas[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3.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ghton*, *East Sussex BN*1 9*RE*, *UK*)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joint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household composition on migration decisions and develops a Probit model of the likelihood of such decisions using data from a large scale household survey in Sichuan province. It suggests that comparing with the nuclear family, the traditional three-generation household encourages out-migration, with the older members providing the secure base from which younger adults can venture out in search of the benefits of a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One of young couple's serious illness ha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igration of the other; while the older members' serious illness in one family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migration of young labor. But for the family with young child, the older members' serious illness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igration of young labor. It is argued that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which could be looked as labor division of rural family,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design of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s.

Key Words: labor migration; household demographical structure; serious illness; rural labor